

1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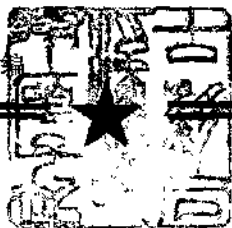
黟县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总 第 12 期)

安徽省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录

“黟山派”开宗大师

——黄士陵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叶玉宽(1)

爱护国宝 奉献终生

——访问故宫博物院欧阳道达先生功迹记略……………王吉琳(5)

新安旅行团的创建者——汪达之……………汪以民(9)

现代知名的数学家、珠算专家——余介石……………汪以民(13)

山城弦歌

记传播文化使者——复旦附中……………叶荫藩(15)

西行吟草……………舒松钰(20)

“黟山派”开宗大师

——黄士陵生平及其艺术成就

叶玉宽

③ 黄士陵（1849—1908）字穆甫，一作牧父，别号黟山人、倦叟、黟山病叟，斋名有蜗篆居，延清芬室、古槐邻屋等，出生于黟县黄村。他家学渊源，父仲和工诗文，著有《竹瑞堂集》，精通说文，擅长小篆。牧父自幼受庭训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由于习研勤奋，在青年时就名噪乡里。清同治年间父母相继去世，为生活计偕胞弟厚甫赴江西南昌开“澄秋轩”艺术馆，兄鬻字、治印，弟画像、照相，兄弟两人相依为命，朝夕相聚切磋书画技艺。

牧公在南昌因鬻书，治印水平较高而受到江西省学政汪鸣銮的敬重并为其延誉，使之结识了一些金石名家，终于当了清末大金石家吴大澂、端方的幕客，协助他们编著若干金石书籍。

光绪七年（1881年）牧公转入广州营生，此时与学者、将军沈泽棠父子和梁肇煌等人过从甚密，得见许多珍贵文物，扩大了视野，增长不少学识。在广州羁留三年后入北京国子监南学肄业。又在国子监祭酒盛伯羲、王懿荣、广东省巡抚吴大澂等大金石家处，博览金石原件和金石著录，更丰富了金石学知识，在京时曾为盛伯羲重摹刻阮元复宋本石鼓文（刻石嵌置韩文公祠壁）。光绪廿九年（1903年）金石家秦文锦（纲孙）曾用此拓本来集联，由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其跋文云：“……黄穆甫先生手勒者为最佳。先生工

2097/48

篆隶，尤精铁笔，虽云重摹阮本，实则研心真拓、体会入微，故能形神毕肖，超出阮本之上”。

光绪十三年（1887年）牧公国子监学成后复去广州，次年广东巡抚吴大澂延入幕府，朝夕研讨金石，曾为他拓《十六金符斋印存》和编辑《续说文古籀补》，又重摹刻汉《刘熊碑》。（笔者曾亲眼见过牧公手钩摹本，正面为墨色，反面加一遍朱色，以上石之用。）后吴大澂调抚湖南，公未随行，复受张之洞延入广雅书局协助梁鼎芬主持校书堂，先后在广州住了18年，在此期间探究三代、秦汉的金石文字、玺印，致力于印外求印，大胆创新，开辟自己的蹊径。当皖、浙两派以次衰歇之后，他异军突起于广东，世称为黟山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离开广东，又受聘于湖广总督端方幕下（鄂州）。从事《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等书的编著工作。正当他艺术创新的黄金时代不幸患上哮喘症，干了二、三年就退隐还乡了。从此不复出山，兴筑瓦屋数间以安度晚年。因建于黄氏宗祠旁，故命名“旧德邻屋”，又因祠前有古槐两株，故又名“古槐邻屋”并刻印章，题跋纪其事。牧公在养病之际，对艺事也未中辍，而且降低润格，有自刻“在黟减半”楷字印为证。可见他对故乡人氏怀有深厚感情。返里后病况愈未愈严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突然恶化，于次年农历正月初三日与世长辞了。端方曾致挽联文曰：执竖株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出为名臣，处为名士；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公已立德，我未立言。”是对其生平的恰当评价。

牧公八九岁时就开始习篆，初受父启蒙，进而私淑邓石如，书体线条流畅，气势舒张，婀娜多姿。《多心经印谱》的题签可见一斑。他早年多以小篆入印，一方多字印，宛如一幅书法作品，此亦

师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稍后，研习吴让之、赵之谦风格甚多，均能得其神髓。沙孟海先生《沙村印话》中云：邓氏兴而皖遂亡，新安后生成就之卓莫若黄牧甫，所作纯乎邓赵，非复程（邃）巴（慰祖）旧体。”这一评论颇有见地。后来又转师西泠各家，偏爱丁敬、陈曼生，刀法娴熟，风格酷肖。他三十岁前后所刻《心经》语印（54方），多为皖浙两派各家风范，是早年摹拟期的一份较全面的答卷，也是探索牧公篆刻创作道路的重要资料。中年时直追秦汉玺印，并向印外求印，广泛取材于周鼎彝彝、秦汉瓦当砖甃，以及诏版、泉币等古文字，各体悉备两熔铸一炉，故其篆刻作品富有金石韵味。其用刀以薄刃直冲，线条光洁犀利，纤处不弱，肥而不臃，故有扛鼎之力。印章边栏从不敲击矫饰，毫无造作之态。邓散木在《篆刻学》中评云：“黄牧甫篆刻鼓刀直入，犀利无前，腕力之强一时无两”，此言实非过誉。在章法上更显其独特风貌。表现在方圆并用，粗细互存，疏密自然，寓险绝于平正之中，藏奇巧于古拙之内，粗看貌不惊人，细察耐人寻味。印家叶一苇认为“看似寻常最奇崛”。牧公篆刻边款亦堪一绝，晚年以单刀刻魏楷，颇似斜风细雨，潇洒别致。亦偶作金文款字，更具典雅古朴。边款内容大量的书论、印论和翰墨情谊的记述，文词隽永与刚柔相济的篆刻交相辉映，珠联璧合。牧公在接受治印传统的法乳之后，通过自身的灵感，使之俱化，终于达到灵蛾破茧的升华意境而卓然成一大家。后学者称为黟山派，在中华印坛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并名驰台、港和日本等地。

一位篆刻家能登峰造极，必然有深厚的书法和古文字学的功底。牧公自不例外，他幼时就从父仲和公学说文习小篆、古文。后汲取邓石如篆书笔意，线条流畅，婀娜多姿。到中年开始摹绘钟

鼎，同时临写铭文，大篆形体久之既熟，又能融汇各器文字之长，从而变小篆的细长形体为方整，笔画改纤细为粗实，在平直中偶出曲笔，舒张的体势一跃为谨严凝重。用笔亦非纯乎回锋圆转，有时出现侧锋方折之笔，甚至有悬针现象。由于用笔方圆兼施而能在平实中寓奇险之笔，故气韵生动。此时牧公的篆书已完全跳出邓石如、吴让之的窠臼而独创一体。他自以为“合以古籀”并刻印章、常用于篆书作品上，归里后曾用自创篆书体节录明代吕坤《呻吟语》计50页1600余字的书册，气势贯通浑然一体。是一件罕见的珍品（已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6年按原大影印出版）。其书画作品的款字，也同样富于变化，早年用二王行楷，到三十岁左右多以隶书，四十岁以后则一变为非篆非隶，瑰异奇古，世称为魏楷，其实为篆、隶、行、楷兼而有之的混合书体，则熔化于一炉的独创书体。后学者往往仅能摹其形而不能得其神。牧公书法因未曾发表，流传欠广故知者较少，自《呻吟语》篆书册出书以后，当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所赏识。

牧公擅长书法、篆刻之外，还兼绘事。因阅《西清古鉴》得到启示，而摹绘钟鼎彝器。先以淡墨钩摹器形、纹饰，再设色，有黑、绿、紫等色，颇似青铜器的古色，区分阴阳向背，立体感甚强，故形态逼真。广东多奇花异草，也成为他描绘的对象，师法郑板桥的纸窗花影，或对花写照籍留稿本。枝、叶、花、果皆双钩其形貌，然后施以重彩，突出阴阳明暗，故姿态如生，为世人所宝爱，踵求者甚多。惜乎他谢世过早，以致数百件画稿未及成画，更不幸者，这笔宝贵遗产在种种原因下散失殆尽。故其画名鲜为人知。

牧公一生多才多艺，其挚友魏体书家陶濬宣先生曾书赠一联语

云：“金石刻画臣能为；搜抉肝胆我应哭，”是对他艺术生涯的高度概括。

爱护国宝 奉献终生

——访问故宫博物院欧阳道达先生功迹记略

王吉琳

欧阳道达先生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为人敦厚，正派耿直，知识渊博却不善言辞；工作认真，要求严格，处事果断而不徇私情。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数十年，为整理国故，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默默地奉献毕生的精力。

欧阳道达，名邦华，道达是其字，安徽省黟县渔亭镇人。他1893年出生于渔亭欧村的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期，在家乡的私塾及碧阳高等小学就读，成绩优异，于1911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学习。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因成绩优良，被留校任助教，后升任讲师。1924年又被选送到清史委员会工作。这时，他参与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离宫的文物清点工作。因其古文字功力深厚，工作又认真负责，深得负责清点工作的马衡先生所器重。1927年，欧阳道达应朋友之邀，先后在浙江省立四中和七中高中部任教。

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诬监守自盗，报章哗然，轰动一时。易院长由此积郁成疾，饮恨身亡。由故宫博物馆馆长马衡先生接任院长。马院长深知道达为人忠厚笃实，知识渊博，特致函送

达，邀他来故宫博物院工作。1933年冬，欧阳道达应马院长之邀，来到北京，在故宫文献馆任科长。

正当故宫博物院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之后，进逼华北，平津告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同意故宫博物院的报告，批准将故宫文物南迁。欧阳道达参与了这次文物南迁的组织、包装、监运工作。文物专列由军队护卫，绕道陇海南下，于第四天到达南京，因首都南京没有库房，只好又返回上海，暂时存放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等处。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以故宫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为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首都南京正在建设库房。1936年下半年，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建成。同年冬，存沪文物先后运抵南京。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成立分院，由故宫博物院的欧阳道达和庄上严等三位科长负责分院的事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京。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江湾和虹口发动袭击，我方即予反击。8月底，日军增至十万人，双方多次激烈战斗，我方伤亡惨重。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同时下令故宫运抵南京文物，再次转移，避敌西迁。蒋介石迁都重庆的消息一传出，南京城内一片惊慌，人心惶惶。南京政府的一些要员和社会上层人士也都在想法疏散。文物西迁也不可能象南迁时那样，有专列装运，就连运输工具和搬运工人亦很困难。故宫领导经过权衡，决定采用水路、铁路、公路同时并行的办法，选择三条尽量能避开战火的路线，分开运输。相约在面南腹地四川和贵州重聚。欧阳道达这次是随旱路运输的一组负责监运工作。

文物是在战争的情况下转移，往往为了躲避敌机的空袭，有时

要日夜兼程赶到某地停留；有时在运输途中遇上敌机就得随地停下隐蔽；有时还得在野外宿营；如遇上暴风雨，随行的工作人员就更苦了，要到处巡视；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有时简直是连吃饭睡觉也顾不上。每到一处，停留多久，得视当时情况而定，一停数日、数月乃至数年。西迁文物的监运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欧阳通达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和肩负着保护祖国文化艺术珍品的高度责任感，历尽艰辛，克服种种困难，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文物的安全这样一种精神，把西迁文物完整无损的运抵贵州安顺和四川的乐山和峨眉。

故宫博物院为了管理好西迁文物，在重庆设立了总办事处，并分别在安顺、乐山和峨眉分别设立办事处。欧阳道达任乐山办事处主任。乐山办事处下属有七个文物库房，都是利用当地的祠堂和庙宇，条件简陋，互相之间距离都有好几里路。欧阳道达他工作是认真的，西且事必躬亲，经常要到各个库房视察，没有车马，往返全靠步行。在他的身数影响下，大家都认真地做好文物的管理和安全工作，使文物在保管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安全无恙。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1947年故宫博物院决定将存放在安顺、乐山、峨眉的文物集中到重庆，经过稍事检查和整理，然后用轮船运往南京。而迁文物返回南京仍存放在朝天宫库房，南京分院由欧阳道达全而负责。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平津、淮海各战场取得胜利以后，挥师南下，势如破竹，逼近南京。蒋家王朝面临覆灭，蒋介石被迫撤离大陆，逃窜台湾，同时下令把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也运往台湾。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翁文灏，指示杭立武等负责把存放的珍贵文物19557箱，再择其中珍品计2972箱，

秘密运往台湾。同时规定，文物必须在夜间由可靠的人装船，故博工作人员不愿去台者均不得接近文物。运台文物是由海军部派出的“中鼎船”和“昆仑舰”以及招商局的“海沪轮”分别运往台湾基隆的。当第三批文物运出以后，已是1949年1月底了。欧阳道达作为南京分院的负责人，他不愿随蒋介石去台湾，同时又要防避某些人乘机混水摸鱼，盗走文物，他当机立断，组织故博留在南京的工作人员，带领建筑工人用钢筋水泥，将南京分院上下库房的门封闭起来。由于采取了这一果断措施，确保了留在南京库房文物的安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任命欧阳道达为南京分院主任。1950年故宫博物院着手进行南迁文物的北返工作。1954年故博南京分院改为办事处。随着文物的北返，北京故宫要整理明清档案，欧阳道达又是故宫文献馆早期工作人员，对明清档案又很熟悉，故宫博物院就将欧阳道达调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档案部主任。1955年，档案部从故宫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欧阳道达也随之调第一历史档案馆任第一副主任。同时他参加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8年，第一历史档案馆要搬迁，欧阳道达在1969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住在北京。

欧阳道达在故宫工作多年，他博闻强记，对故宫各类典相当熟悉，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它的渊源。他退休以后，故宫博物院又聘请他担任顾问，直到他1978年因病逝世。

欧阳道达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默默地把他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博事业。

注：资材来源：

1、本文作者1985年5月赴京访问欧阳道达的老同事，已退休的专家单士魁、张德泽先生和现仍在故博工作的专家梁匡忠、李怀璠先生；第一历史博物馆宋同志的记录。

2、本文作者1985年5月访问欧阳道达先生次子，现任北京航空学院招收研究生办公室副主任欧阳经武的记录。

3、参考《中国文物报》姜舜源先生的《故宫文物大迁移》一文。

4、参考《团结报》黄萍荪先生的《国宝南迁话沧桑》一文。

新安旅行团的创建者——汪达之

汪以民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实践者、新安旅行团的创建者、知名的人民教育家汪达之，是我县碧山村人。出生于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5月6日。父亲是位秀才，教蒙学兼行中医，在贫病交困中去世。达之是遗腹子，家境贫寒，全靠母亲为人缝洗，维持一家六口（有年老多病的婆母，四个未成年的儿女）的生活，十分艰难。汪母竭尽全力供养儿子读书。达之在县高级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繁昌县平清铺和望江县吉水镇当了几年小学教师。

青年时期的汪达之，目睹国家的贫弱，人民的苦难，处于极度苦闷和彷徨之中，1919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兴起，促使他开始积极寻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道路。1923年（民国十二年），他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创立旨趣》中，初次接触到陶行

知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向往陶提的“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张。他从自己几年的乡村小学教育的实践中，认识到陶行知提倡的改造中国乡村教育的运动。也就是改造中国的运动。对陶行知决心“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倡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十分感动，决心到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学习，探索从改造中国教育入手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汪达之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成为“晓庄师范”的第四期学生，与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等同学，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1929年春，到苏北淮安清河下镇莲花街，由陶行知兼校长的私立新安小学执教。从此，他成为陶行知教育理论最热忱的实践者和为中国革命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民国十九年）4月，南京晓庄师范师生因反对英日舰队侵入长江和支持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大罢工，遭南京政府封闭，革命青年惨遭屠杀，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汪达之临危受命，接任了新安小学校长职务，在同事台和中、孙铭勋相继离开后，“只有他一个人”在校“继续指挥作战”。

新安小学是南京晓庄师范在苏北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学校，创办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6月6日。校舍是一所破旧的古庙，教师全无薪金报酬，办学经费只有新安会馆而个田庄的收入（全年三百多元）和晓庄师范每月津贴五十元。晓庄师范被封后，新安小学就中断了大部分经济来源，常连玉米稀饭也吃不上，政治上又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传统的教育界不认为它是一所学校，新安会馆的把持人又侵占会馆财产，情况更加窘困，汪达之坚韧不拔，一面依靠陶先生的支持与几位办学人员的艰苦奋斗及一些晓庄革命同

学的支持，一面与侵占会馆的旧恶势力据理争斗，打了几年官司，获得胜诉，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坚持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

在艰苦的年代里，汪达之的哥姐都不幸早逝，年迈的汪母，为支持达之所从事的事业，依然靠自己的劳动，过着贫困而孤独的生活。陶行知对新安小学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汪母的牺牲精神极其崇敬，他在孙铭勋著的记叙“新小实践的《古庙活菩萨》一书的扉页上题词，“献与牺牲主义躬行实践之汪母”，又为“新小”的同志写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著名条幅。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0月23日，汪达之创造性地将“新小”七个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由淮安经镇江到上海，旅行了五十天。这七人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二岁。他们自己民主管理团体的一切，采取到各大学去演说和上街卖报的办法，筹集费用。通过参观工厂，访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凭吊“一·二八”战场等，受到了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事迹在旧中国的教育界、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成为旧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

陶行知为此赋诗：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子。划分新时代。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0月，汪达之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在中共上海左翼教联支部和陶行知的赞助下，将“新小”的十四名基本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本人以“顾问团员”的身份，参与团务干事会

的领导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新安旅行团在党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刁难、打击、迫害，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坚持向城乡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作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决定新安旅行团从广西桂林秘密、分批经香港、上海转到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自此，它随军转战苏北、山东、冀南各地，既是一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对象的工作队，又是一支文艺宣传队。1949年春，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工作，1952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新旅”和其他几个宣传团体合组为上海歌舞剧院。

新安旅行团在历时十七年时间，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阶段，足迹遍及祖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行程二万五千余里，为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丰硕成果，也是汪达之对党对人民的巨大贡献。“新旅”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致“新旅”的信中说：“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1941年12月，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说，汪达之同志是我们党外的优秀的布尔塞维克。1985年，淮安县举行新安旅行团五十周年纪念时，胡乔木代表党中央题词：“新安旅行团的历程永远是全中国儿童的表率。”

在抗日战争中，汪达之历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四十二岁，与从事教育事业的共产党员杨南琛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主持恢复南京晓庄师范并任校长，后调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广东省三届政协委员等职。他在广东省民族学院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达之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却始终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1972年患脑溢血病，卧床八年，于1980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中共江苏省委、淮安县委和群众代表，为了纪念、继承和发扬他的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特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县城下镇莲花街原新安小学旧址，并在县城新安小学新校园内建立了“新安旅行团历史陈列馆”。1985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淮安举办了“纪念新安旅行团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根据《徽州教育志征求意见稿》和黟县县志办公室资料整理）

现代知名的数学家、珠算专家 余介石

汪以民

现代知名的数学家、珠算专家余介石，字慰慈，又名竹平，我县城名贤里人。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出生，幼时思路敏捷，聪颖过人。民国八年（1919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先后任东南大学教员，中央大学助教、讲师，重庆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国立编译馆馆员，四川省立统计学校教授，中央军校数学教官，中央通讯军官学校教官，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执教，1949——

1954年任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并担任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成都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1968年任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数学系教授，先后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和工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1965年兼任北京化工学院数学教授。

余介石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为我国数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编著有《高中代数学》、《高中平面几何》、《高中立体几何》；他和孙克定、胡木五、何商友、徐子豪、张通漠、廖辛初、黄缘芳、李修睦、倪可权等合编高、初等数学教材二十余种以及大学专业书籍二十余种，迄今部分书籍仍在海外再版。他撰写《计算方法与运筹学》论文，得到数学界的推崇。建国后在四川大学工作时，就开始研究珠算改革工作，1953年初，在成都《工商导报》上设《珠算速成法信箱》解答读者问题。晚年全力从事珠算史研究、珠算算理、算法研究，主编《珠算数学研究通讯》和《筹珠联合使用法》、《算盘上见子直拨法》；与长子余宁生合编《珠算速成法》，又与次子余宁旺同编《简易珠算法》等书，是我国珠算界公认的珠算算理创始人与权威。为了弄清珠算的发明时代，他和我国珠算协会顾问殷长生子1954年3月，在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找到了算盘的模式，证实了算盘在我国宋代则已广泛应用。1965年，他在北京图书馆首次发现了程大位编写的《算法纂要》。

余介石为人正直，关心家乡教育，在白色恐怖年代，他以教授身份，掩护和支持过我地下党同志和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其父余育卿病故，他将友人的赠仪五百元，悉数捐赠黟县临漳镇小学分校一私立蔚文小学。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更加勤奋地从事高

等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科研论著我国的珠算改革、使用、推广起了积极作用，他编译的《计算方法和运筹学》等专门论著，对我国数学教学工作的推动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幸因受“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于1968年12月26日含冤逝。含冤逝世，终年六十八岁。1983年7月26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予以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

（根据《徽州教育志征求意见稿》和黟县县志办公室资料整理）

山。城 弦 歌

记传播文化使者——复旦附中

叶荫藩

引 子

抗日战争以前，黟县没有中学，可是小学与私塾到很普遍。著名的在清末有碧阳高等小学堂，其后又有公立碧阳小学。还有热心桑梓教育的范蔚文捐资兴办的城中蔚文小学、六都横岗吴子敬捐资创办的敬业小学、地方名宿胡敬庵办的杏墩家塾、西递名宿胡霭溪办的崇实学塾、卢村前清举人卢琪玉办的雉山小学。办女学的也有几处：西递黄杏仙办的崇德女校，城中胡容璋办的邱氏女学、汪印办的程氏女学、汪家巷舒闰眉办的汪氏女学等等。

黟县人虽然重视教育，主要是为从事商业服务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小学里读到十三、四岁，就要送到外地商界中去当“学

徒”，故有“十三、四岁，望外一丢”之说。这些青少年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书本知识，结合三年“学徒”、三年“半作”的实际操练，算盘、书字、经营方法，都能通晓，到了弱冠之年，纷纷脱颖而出，于是荣归故里，省亲、联姻，认为这是人生最光彩的事。如果在三年之中，遭到老板辞退回家的，认为是“回乡保”，无出息，是最受人瞧不起的。所以一些青少年在学校里就必须认真读书，一旦走出家门，也就有了立身、谋生之术。也有一些厚实之家，不愿自己的子弟去当学徒，于是在小学毕业后，就去休宁万安徽州中学读书。至于女孩子，比较开明的人家，让她们在女学或者小学毕业后，留在家中学习女红、刺绣一类的事。当时屯溪隆阜还有一所徽州女子中学，我县的姑娘要送到那里去读书是极少，有一句封建老话，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把女子培养上大学，那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烽火中诞生的复旦附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点燃着抗日的烽火，京、沪、苏一带相继沦陷，同年冬，苏州东吴大学部分教师随着本县人叶芳珪先生来到黟县，次年春，就在碧阳书院原址，开办东吴大学附中，此为我县有了中学之始，当时执教者，均为东吴大学知名学者。如主任孙蕴璞、教师沈祖懋、陈海澄、程小青、吴献书、张梦白、作家周瘦鹃等，入校的学生，大部分均为本县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则为京、沪、杭避难回乡的青年。当时初中设立三个班，高中一个班。另外，还办了一个商业补习班。可惜只办了一学期就结束了。当时在黟县、屯溪的复旦校友，就酝酿筹办复旦大学附中，由复旦大学回乡的吴道存老师，写信征求重庆复旦大学部的同意，接着备文呈